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硕士学位论文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研究
——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培养单位： 劳动经济学院

专业名称： 社会保障

作者姓名： 朱晓晓

指导教师： 徐 芳 教授



硕士学位论文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基于 CLH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培养单位：劳动经济学院

学科专业：社会保障

作者姓名：朱晓晓

指导教师：徐芳 教授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ce Mod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LHLS Data**

Candidate: Zhu Xiaoxiao

Supervisor: Prof. Xu Fang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China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多，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再到精神保障，心理健康关系到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和养老质量，促使着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与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对于社会正式养老资源缺乏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仍将是其主要的养老模式，作为养老模式的一个方面，居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同住对老年赡养来讲是最好的居住方式，尤其是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及时获得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从而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同时需求的满足情况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因而我们提出假设：有成年后代同住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 logit 回归方法分析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从抑郁倾向维度来看，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因素后，有成年后代同住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显著抑制作用，并且从单项抑郁指标来看，有成年后代同住对缓解农村老年人的紧张害怕感、孤独感和无用感都有显著作用；生活满意度方面，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因素后，有成年后代同住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最后从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目的出发，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从而促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心理健康；抑郁；生活满意度

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pension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afeguard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improving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the family pension is the main old-age support method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especially for the rural elderly who lack the formal old-age care resources, and the children will continue to be their main pension support provider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terms of pension, different living methods in a certain extent affect the children's supportive behavior. Living together with children is the best way of living for the elderly, especially living with adult offspring,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get financial support, life care and emotional support conveniently and timely to meet the elderly needs.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dem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we hypothesize that living with adult offspr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above assumption, the study uses the CLHLS data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variate logit regress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iving patterns of rural elderly on mental health. We ha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ression, with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status controlled, living with adult offspring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depression for rural seniors. In terms of life satisfaction, following the control of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status factors, living with adult offspr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Finally, learning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e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ld-age care industry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elderly; Living pattern;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Life satisfaction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1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2
1.2.1 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相关研究	2
1.2.2 研究述评	4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5
1.3.1 研究方法	5
1.3.2 研究技术路线图	6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7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7
2.1.1 居住方式	7
2.1.2 心理健康	8
2.2 相关理论基础	9
2.2.1 老年需求理论	9
2.2.2 社会支持理论	10
第3章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居住状况	12
3.1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12
3.2 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情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2
3.3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4
3.3.1 样本的性别分布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14
3.3.2 样本的年龄分布情况	14
3.3.3 样本的婚姻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15
3.3.4 样本的民族分布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16
3.3.5 样本的受教育情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17
3.4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8
3.5 不同类型个体对居住方式的选择	19
第4章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的影响	21
4.1 研究设计	21

4.1.1	数据来源	21
4.1.2	变量设置及其释义	21
4.1.3	模型构建	23
4.2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回归分析	24
4.3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28
第 5 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5.1	研究结论	31
5.1.1	有成年后代同住对缓解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显著作用	31
5.1.2	有成年后代同住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31
5.2	政策建议	32
5.2.1	弘扬传统孝文化，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同住	32
5.2.2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全面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32
5.2.3	推进适老化改造，建设老年人宜居环境	32
5.2.4	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子女与老年人同住	33
5.2.5	健全随迁政策，保障随迁老年人生活便利	33
5.2.6	开发亲情住宅，方便子女和父母同住	34
	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35
	参考文献	36
	致谢	38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已经进入“银发”社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总人口已经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¹。据联合国预测，2030年与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分别达到16.3%与23.6%。庞大的老龄人口使我国面临新的课题。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人口对社会保障的要求越来越多，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再到精神保障²，心理健康关系到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和养老质量³，促使着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与完善。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其中“有快乐”是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态。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分析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探索促进老年人良好心理状态的对策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现有文献分析以及现实生活经验表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由于养老体制完善，老年人经济相对独立且有稳定的养老支付来源，有关养老模式的研究都会与居住方式紧密相联⁴。我国传统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对于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正式养老资源不足，长时间内家庭养老仍将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而居住方式作为养老模式的一个方面，不仅涉及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老年人的赡养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以及隔代家庭越来越多，居住方式不同的老年人在获得家庭代际支持方面存在差异，从现实经验来看，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尤其是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及时获得经济帮助、日常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对于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养老需求的满足情况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当需求获得满足时，老年人的负面情绪就会减少，并且老年人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也会得到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有成年后代同住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以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年数据，使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居住方式对农村

¹ 谢逸枫.中国经济下行比供给侧改革压力大[N/OL]. <http://blog.sina.com>

² 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³ 乐章等.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

⁴ 刘宏等.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揭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其心理健康的内在关系，为促进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同时为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本文研究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目前关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因此本部分分别从这三种观点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寻找现有研究的不足，从而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和创新点。

1.2.1 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而独居或空巢不利于老年人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孙鹃娟（2006）、Guo M（2009）等指出子女外出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水平，但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其中孙鹃娟研究指出，空间上的分离扩大了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观念差异，留守老年人在精神上缺乏慰藉，更容易感受到孤独，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组织的“农村流出人口对老年人生活影响”的调查发现，在子女外出前老年人不孤独的比例超过80%，感到经常孤独和偶尔孤独的比例仅为16.6%；而在子女外出后老年人不孤独的比例下降到49.2%，感到经常孤独和偶尔孤独的比例超过了50%^[1, 2]。宋璐等（2015）研究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有子女迁移的老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人的抑郁水平高，且对于所有子女都迁移的老人，他们抑郁症状的起始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抑郁水平的上升速度却更快；同样有子女迁移的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低于无子女迁移的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且所有子女均迁移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与无子女迁移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差距更大^[3]。考虑到现实中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江克忠、陈友华（2016）在实证研究中采用Maddala的处理效应模型，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与子女共同居住显著地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4]。Hugo（2002）、宋月萍（2014）、舒玢玢和同钰莹（2017）认为子女外出务工会减少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从而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并且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增长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不显著^[5, 6, 7]。Murphy（2007）等认为与子女共同居住对于身体状况变差、经济来源减少的老年人来说是最大的福祉，与子女同住方便老年人获得各种社会资源且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抑郁症状^[8]。靳永爱（2017）等利用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最低，而独居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最高，其次是夫妇同住的老年人，并且发现社区环境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

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在社区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地区，无子女同住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与跟子女同住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之间的差异比较小，而在文化活动少的地区，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要显著低于无子女同住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9]。周建芳等（2008）利用上海市虹口区的老年人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明显比与非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更严重，同时与非独居老年人相比，独居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显著降低，张河川等（2010）在对云南省昆明市老年人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0, 11]。Silverstein et al. (2006) 在对安徽省 60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中发现，居住在三代同堂家庭中的老年人比空巢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显著减轻，并且幸福感显著提高^[12]。姚引妹（2002）对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该地区的老年人以家庭居住作为主要的居住方式，并且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都比较高，但有子女同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没有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研究还指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儿女数量、个人爱好的满足程度等因素对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关系不大，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有没有孩子以及孤独害怕等因素与居住方式的选择有密切关系^[13]。关于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选择，Rossi (1990) 等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居住距离对代际之间的沟通交流产生影响，居住距离比较近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更加亲密^[14]。还有学者认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不仅无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反而需要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增加老年人的劳动负担，使得老年人身体劳累，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心理福利。

第二种观点认为跟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没有积极作用，甚至会降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而无子女同住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E Litwak 和 S Kulic (1987) 认为与子女居住距离的远近对老年人获得经济帮助和情感支持的影响不大^[15]。王小龙、兰永生（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正面影响，对于农村留守老年人来说，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为获得的照料减少而对老年人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16]。任强、唐启明（2014）使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基线数据，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三方面分析了老年人不同居住方式对情感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是否与配偶共同生活对老年人的幸福感起到关键作用，不管是否与子女同住，丧偶老年人或配偶不在身边的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较高；独立生活的老年夫妇和在三代家庭生活的老年人幸福感较强，而在二代家庭生活的老年人，包括只与成年子女一起生活或只与孙子女一起生活对老年人的情感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独居或与其他亲属同住损害了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但与非亲属同住的老年人不存在抑郁问题且幸福感最强^[17]。An et al. (2008) 在研究韩国女性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中发现，仅与配偶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比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显著提高^[18]。Hughes and Waite (2002) 利用美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并对老年人的基期健康状况进行控制，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下一期的抑郁

症状相对于只与配偶同住的空巢老年人明显加重^[19]。日本家庭社会学家森冈清美(1999)提出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赡养的两方面作用,一方面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方便子女随时照顾老年人或更好地护理患病的老年人,对老年赡养来讲是最好的居住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容易产生代际矛盾,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20]。

第三种观点是相同的居住方式在不同条件下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可能有所差异。穆滢潭、原新(2016)研究发现,对于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城市中低龄老年人来说,与子女共同居住并不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而对于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状况都比较差的农村大部分老年人来说,与子女共同居住可以有效促进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对农村老年人来说,网络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甚至超过了与子女共同居住,但网络家庭对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却具有明显的负效应^[21]。沈可、程令国(2013)分别基于有偶老年人和无偶老年人子样本研究发现,与子女合住显著缓解了丧偶、离异或未婚老年人的抑郁倾向,而对有偶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并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无偶老年人与子女合住有效改善了其生活满意度,但与子女合住对再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影响^[22]。唐丹(2010)对老年人抑郁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群体中,与配偶或者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比例较低,而对于农村老年人,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或者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高于独居老年人,但仅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低于独居老年人^[23]。

1.2.2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在关于居住方式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怎样影响的问题上,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与子女同住对有效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而独居老年人或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但也有学者认为与子女同住没有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效应,甚至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极作用,而不与子女同住更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因此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现有文献大多以全体老年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的是整体上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晌,而基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城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相比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更多依靠家庭养老,居住方式对老年生活的影响更大,有必要对城乡老年人分别进行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农村老年人为对象,探讨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1.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搜集资料，在文章实证分析中主要使用 StataSE 统计软件对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1）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有关居住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为分析居住方式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通过总结现有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从而找到研究创新点。此外，通过认真研读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问卷，结合研究目的找出了适合本研究需要的变量。

（2）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时，采用了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采用 Excel 对样本的居住方式、抑郁倾向、生活满意度、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健康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运用 StataSE 统计软件，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了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1.3.2 研究技术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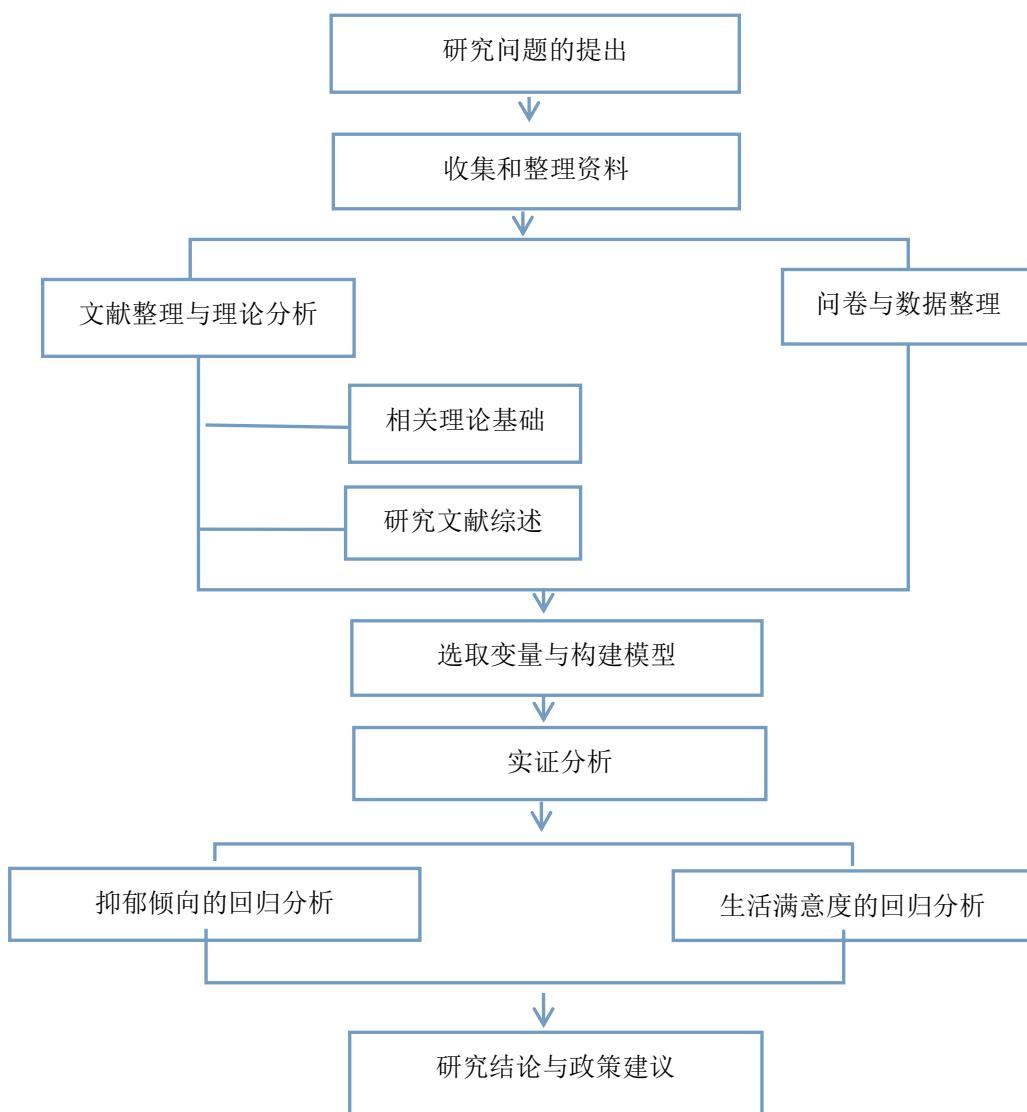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研究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首先要对居住方式、心理健康的慨念进行界定，这也是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

2.1.1 居住方式

居住方式，或称居住安排、居住模式，具体指的是与什么样的人居住在一起。在发达国家，由于养老体制完善，老年人经济相对独立且有稳定支付来源，有关养老模式的研究一般都会与居住方式紧密相联。而对于我国，由于传统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很多老年人人口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因此养老模式包括居住方式与经济来源两个方面⁵。长期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单一，以多代同堂为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出现多样化。在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养老问题更加突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居住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分为五种方式：独居、仅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包括孙子女）同居、与其他亲属同居以及与不相关的人同居⁶。学术界关于居住方式的研究较多，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便性，学者们将居住方式划分了不同的类别。姚引妹（2002）按照居住的空间位置，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划分为院居和家居^[13]。杜鹏（1998）、曾毅（2004）和孙鹃娟（2013）按照居住的成员结构，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划分为单身户、夫妇户、二代户、三代户、隔代户五种类型^[24, 25, 26]。此外，郭志刚（2002）、陆杰华（2008）和曲嘉瑶（2014）根据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包括孙子女）同住进行划分^[27, 28, 29]。

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和城镇化客观上导致了空巢老年人或独居老年人的出现，另一方面老年人自身养老的需要应该是居住方式选择的主导因素^[30]，老年人的自身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等也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杜鹏（1998）研究发现，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以子女或者其他亲属提供的经济帮助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共同居住^[31]。郭志刚（2002）发现年龄、婚姻状态、职业、城乡都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并且他认为子女数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高龄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有很强的性别偏好性^[27]。姚引妹（2002）对长三角农村地区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中发现，该地区老年人的居住选择与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之间的关系不大，但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13]。王萍（2007）等研究劳

⁵ 刘宏等. 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4)

⁶ 张丽萍. 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J]. 人口学刊, 2012(11)

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变动，发现年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说明老年人因为考虑子女的需求而尽可能选择独立生活^[32]。张莉（2016）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拥有的经济资源影响高龄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同时发现亲属关系网、社会参与程度和居住偏好也影响着高龄老年人的居住方式^[33]。

基于我国的养老现状，居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传统居住模式的改变对老年群体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有研究发现，居住方式从共同居住向分开居住的方向发展，使得子女赡养父母的可能性减小^[34]。日本有名的家庭社会学家从居住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居住方式对老年赡养的正反两方面功能，他指出：老年赡养除了受到老年人职业、收入、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以及和子女的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也对其产生影响，并且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对老年赡养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方便随时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对老年赡养来说是最好的居住方式；另一方面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造成代际之间接触过多，不仅容易侵犯对方的隐私，还容易发生代际间冲突，对老年赡养的影响是负面的^[20]。学者们还发现居住方式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席红艳（2016）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独居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认知健康状况最好，与子女同住或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次之，而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最差^[35]。沈可、程令国等（2013）研究发现多代同堂有助于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从而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22]。

2.1.2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一个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同。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健康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心理健康。首先心理健康包括心理状态和心理调节能力两个方面：心理状态指个体在某时刻或时段的自我感觉，尤其是情绪的好坏；心理调节能力指个体将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到适当水平的能力。其次心理健康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状态，个体心理不健康并不是心理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健康，而只是某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健康⁷。对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理解，首先心理健康的标淮是相对的，心理健康反映的是个体能够良好适应社会所应该具有的一般要求，实际上绝大部分个体的心理状态处于极端精神完美状态与极端心理不健康状态之间；其次心理健康的标淮是复杂的，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等不同的群体，心理健康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方式^[36]。

正如前文讨论，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老年人来说，积极适应环境的变化，保持情绪稳定与心情愉悦并且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对社

⁷ 殷恒婵, 傅雪林. 对体育锻炼心理健康效应的分析与展望[J]. 体育科学, 2004(6)

会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多，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再到精神保障，促使着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与完善⁸。心理健康成为反映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对老年人心理的研究越来越多。已有关于心理的研究中通常采用抑郁倾向和生活满意度正反两个指标来度量心理健康。抑郁倾向是反映心理健康的负向指标，刻画的是老年人在面对社会负性事件时所产生的孤独、紧张害怕以及无用感等消极情绪。老年跟踪调查中无法通过专业医疗机构对每一位被访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进行诊断，通常通过设计一系列的量表来度量老年人的抑郁倾向⁹。生活满意度是老年人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整体评价，也是体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正向指标，通常在问卷中设置问题“您觉得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来测量。虽然抑郁倾向和生活满意度都能反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提升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的因素不一定显著老年人的负面情绪，同样对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不一定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譬如有研究显示，其他条件相同的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老年人，但同时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普遍高于其他条件相同的男性老年人。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老年需求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首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层次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¹⁰。需求对于人类是共通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同样需要不同层次的需求。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维持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如对衣食住行的需要，对老年人来说满足衣食住行首先要保障其经济收入来源，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下降造成经济收入减少，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日常开支状况，从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安全需要是保障自身安全以及摆脱各种威胁带来损害的需求，如对疾病的预防，避免经济遭受损失，以及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等¹¹，安全需要对老年人来说主要指预防疾病和躯体受到伤害、生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以及行动不便时能够得到照顾；社交需要包括情感需要和社交需要，其中情感需要包括对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渴望，社交需要指的是对归属感的需要，即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群体一员，老年人害怕孤单寂寞，渴望子女、亲戚的亲情，还有邻里、朋友的友情，希望与人沟通交流和有长期稳定的感情寄托；尊重需要是指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能够被社会和他人所认可，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可交换的资源减少，因而受到的尊重程度相

⁸ 陈良瑾.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⁹ 沈可. 居住方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3

¹⁰ 吴兴旺.“双高”企业西迁的深思[J]. 中国发展观察, 2005(10)

¹¹ 张琳.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与供给研究[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3)

对降低，甚至会受到年龄歧视，同时老年人在情感方面更加敏感，更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是对社会贡献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力虽然下降，但仍然希望通过参与一些可以产生积极情绪体验的社会活动，例如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在参与这些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需求理论指出，老年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除了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外，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并且老年人的需要满足情况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当老年人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能有效抑制老年人的负面情绪，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根据前文分析，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来源、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上，因此为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应该尽可能地满足老年人在各方面的需求。

2.2.2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是在研究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关于社会支持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美籍华人教授林南（1981）提出，社会支持是由社会网络所提供的可以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支持或表达性支持^[37]。李强（1998）从社会资源作用的角度来定义社会支持，他认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可以缓解精神紧张状态、减轻心理压力以及提高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一种影响作用^[38]。贺寨平（2001）认为社会支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网络中获得自己需要的支持资源，包括亲情、友情、金钱等，这样通过社会支持网络可以维持社会中每个人的正常生活^[39]。蔡禾（1997）认为社会支持即社会支援，是从社会中得到的，来自社会各个人群的支援和帮助^[40]。章谦、张建明（1996）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支持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弱势群体，即社会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41]。此外韦尔曼（1988）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关系会提供不同的社会支持^[42]。

社会支持是个体能够获得的、与各种社会关系有关的外部资源。从表现形式上看，社会支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实际得到的支持与个体在面临压力时获得的来自周围人提供的实际帮助行为；另一类是主观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尊重、被他人支持与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足以及与个体主观感受密切相联的支持¹²。此外，从不同性质的提供者角度可以把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正式的社会支持指得是由正式的组织所提供服务的集合，如政府、社区提供的服务，而家庭成员、亲情和邻居等提供的服务的集合则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得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国内学者

¹² 豆间. 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4(6)

刘晓和黄希庭认为，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种：主效应模型、缓冲效应模型和动态效应模型。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它可以维持个体平时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态，从而有益于个体的身心健康；缓冲效应模型指出，社会支持仅在压力情况下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通过缓冲或抑制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来保持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动态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心理压力与心理健康三个变量相互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复合关系，应当把社会支持和压力同时当做自变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发生作用¹³。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支持对于维护个体的正常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增大和身体功能衰退，老年人的自我支持能力减弱，需要依靠外界的支持和帮助来维护正常的生活。基于我国养老现状，政府、社区等提供的正式养老服务不足或者缺位，老年人更多需要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由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有限，因此家庭支持或代际支持是老年人能够获得的主要社会支持，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在满足老年人需求和保障老年生活方面必不可少。

¹³ 豆建. 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4(6)

第3章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居住状况

本部分依托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年的截面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85.3%的人口，因此该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样本中共包含3516位65岁以上农村老年人，通过对样本的心理健康和居住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可以大概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居住情况。

3.1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对3516位65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如图显示总体上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从抑郁维度来看，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不存在抑郁倾向。69.23%的农村老年人不存在抑郁倾向，具体来看，仅有4.41%的农村老年人感到紧张害怕，不到8%的农村老年人会感到孤独，73.78%的农村老年人不会感到不中用。从生活满意度来看，接近60%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40%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不是太满意。因此，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是满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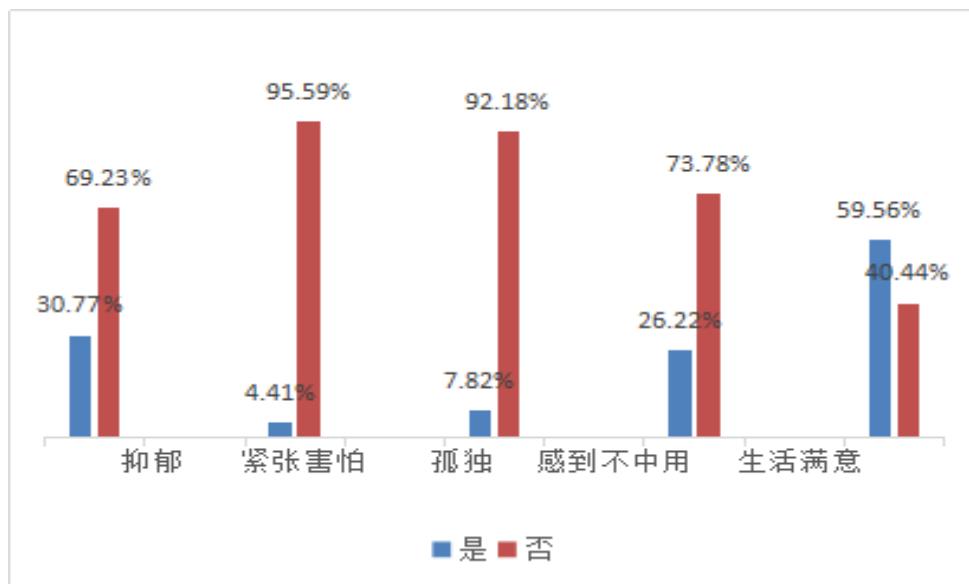


图3.1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3.2 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情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在3516位65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中，与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2003位，占比56.97%，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1513位，占比43.03%。从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与成年后代同住，这符合我国多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农村地区依旧保留

着“养儿防老”的观念，老年人倾向与子女共同居住。但有成年后代同住和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数量相差不大，可能由于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外流，农村老年人身边的成年子女数不断减少，出现大量空巢老人以及隔代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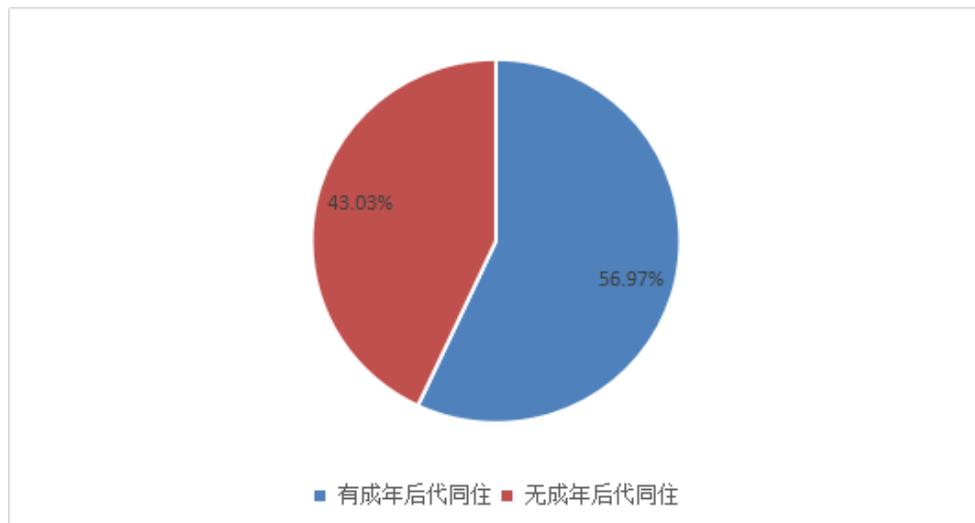


图 3.2 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情况

从居住方式上看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情况，从中发现，无论是与成年后代同住还是无成年后代同住，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这与农村老年人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好是一致的。从抑郁维度来看，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在总体抑郁倾向、紧张害怕和孤独方面的情况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要好，但有成年后代同住的群体中，感到不中用的农村老年人占比反而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群体要高。有成年后代同住的群体中感到孤独的农村老年人占比 6.44%，无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感到孤独的农村老年人占比 9.65%，相差 3.21%，其他方面的差异都不大。从生活满意度看，有成年后代同住的群体中，生活满意的农村老年人占比 64.10%，无成年后代同住的群体中生活满意的农村老年人占比 53.54%，相差 10.56%。因此，表 3.1 显示总体上有成年后代同住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要好，这一结论之后将通过 logit 模型进一步验证。

表 3.1 居住方式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

居住方式	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孤独		感到不中用		生活满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有成年后代同住	30.60%	69.40%	4.29%	95.71%	6.44%	93.56%	26.81%	73.19%	64.10%	35.90%
无成年后代同住	31.00%	69.00%	4.56%	95.44%	9.65%	90.35%	25.45%	74.55%	53.54%	46.46%

3.3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部分主要描述 3516 位样本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以及其分别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3.3.1 样本的性别分布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3516 位老年人中男性有 1592 位，占样本总量的 45.28%，女性有 1924 位，占样本总量的 54.72%。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多了 332 人，这与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有关。从性别角度来看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陷入抑郁的比例均低于不抑郁的比例，其中感到紧张害怕或孤独的农村老年人占比不到 10%。生活满意度方面，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比较满意，只是对生活不太满意的农村老年人相对抑郁的农村老年人比例要高。无论在整体抑郁倾向还是各单项指标，女性农村老年人陷入抑郁的比例高于男性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的比例。但女性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比例比男性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比例高，这表明性别对抑郁和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影响，这一结论说明有必要分别从抑郁倾向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来分析心理健康。

表 3.2 性别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

性别	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孤独		感到不中用		生活满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男	27.14%	72.86%	2.95%	97.05%	6.53%	93.47%	23.49%	76.51%	56.78%	43.22%
女	33.78%	66.22%	5.61%	94.39%	8.89%	91.11%	28.48%	71.52%	61.85%	38.15%

3.3.2 样本的年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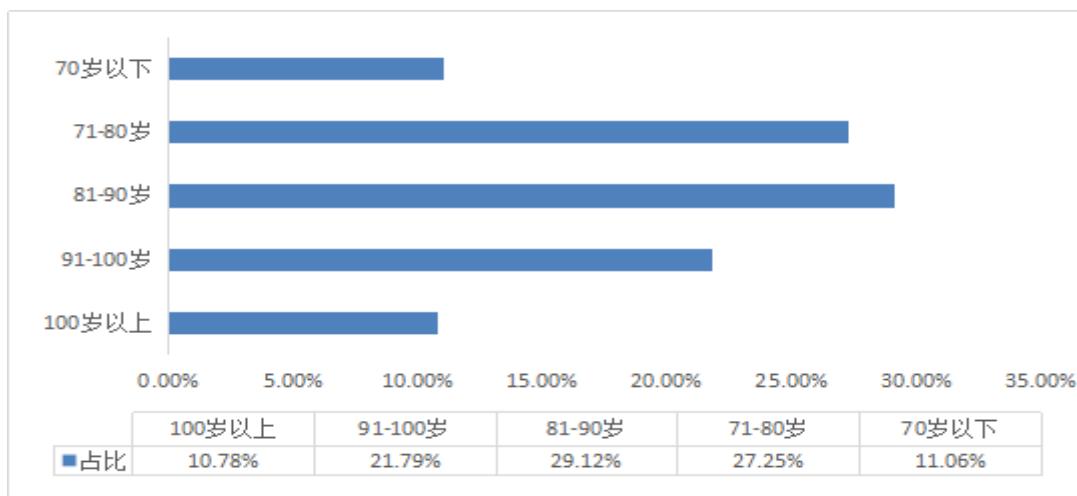


图 3.3 样本的年龄分布

样本中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年龄是 84.80 岁，高于我国同期的人均寿命¹⁴，其中最大的农村老人人 110 岁，最小的农村老人人 65 岁，年龄在 79 岁以下的农村老人人 389 位，占比 11.06%，年龄在 71-80 之间的农村老人人 958 位，占比 27.25%，年龄在 81-90 之间的农村老人人 1024 位，占比 29.12%，年龄在 91-100 之间的农村老人人 766 位，占比 21.79%，年龄在 100 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人 379 位，占比 10.78%。样本中农村老人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71-100 岁之间。

3.3.3 样本的婚姻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从图 3.4 中可以看出农村老人人的婚姻状况，有 38.62% 的农村老人人已婚并与配偶一起居住，2.05% 的农村老人人虽然已婚但不与配偶一起居住，0.26% 的农村老人人是离异状态，0.65% 的农村老人人没有结过婚，58.42% 的农村老人人已经丧偶，综合考虑农村老人人的年龄以及所经历的年代特点，样本中离婚和未婚的农村老人人占比很小，而且样本中大部分农村老人人都是 80 岁以上的，因此丧偶的人数比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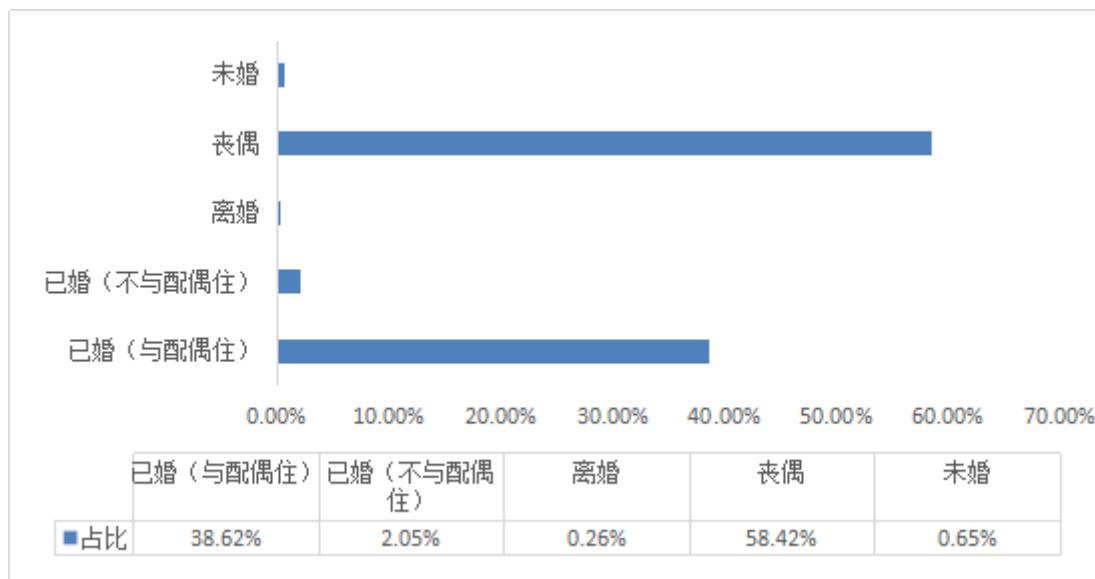


图 3.4 样本的婚姻状态

本研究将农村老人人的婚姻状态处理成了二分变量，其中已婚（与配偶同住）和已婚（不与配偶同住）两种情况合并为“有配偶”，占比 40.67%，“无配偶”则包括离婚、丧偶、未婚三种情况，占比 59.33%。从婚姻状况看我国农村老人人的心理健康，发现无论是有配偶还是无配偶，陷入抑郁的农村老人人占比均比较小，同时大部分农村老人人对生活比较满意，说明整体上农村老人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好。从抑郁维度来看，无配偶农村老人人群体中陷入抑郁的比例更高。有配偶农村老人人出现抑郁倾向的

¹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 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平均寿命 76 岁，排名第 83 位。

比例是 25.38%，比无配偶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比例低 9.09%，单项目来看，无配偶农村老年人中感到紧张害怕的比例比有配偶农村老年人高 1.18%，无配偶农村老年人中感到孤独的比例比有配偶农村老年人高 7.17%，无配偶农村老年人中感到不中用的比例比有配偶农村老年人高 5.89%。从生活满意度来看，有配偶同住群体中对生活不太满意的比例反而高于无配偶群体，无配偶农村老年人中对生活比较满意的比例是 61.94%，有配偶农村老年人中对生活比较满意的比例是 56.08%。可能的原因是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还需要负担配偶的日常生活照顾，造成身体劳累，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

表 3.3 婚姻状态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

婚姻 百分比	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孤独		感到不中用		生活满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有配偶	40.67%	25.38%	74.62%	3.71%	96.29%	3.57%	96.43%	22.73%	77.27%	56.08%
无配偶	59.33%	34.47%	65.53%	4.89%	95.11%	10.74%	89.26%	28.62%	71.38%	61.94%

3.3.4 样本的民族分布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如图 3.5 是样本的民族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样本中包含了不同的民族，这验证了样本具有代表性。其中汉族 3275 人，占总样本的 93.15%，这与我国汉族人口最多的基本情况是一致的。研究中将除了汉族外的回族、壮族等统一归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共 241 人，占总样本的比例为 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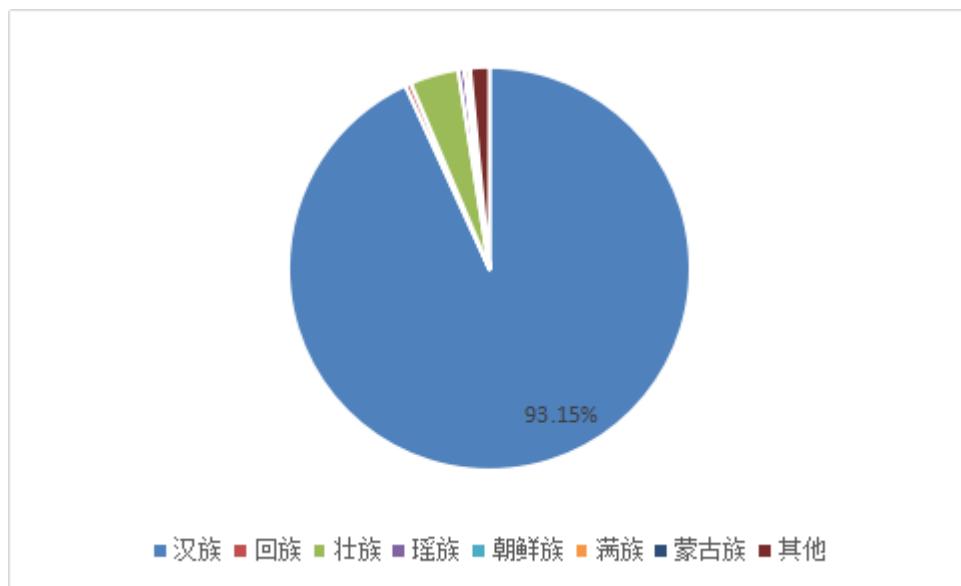


图 3.5 样本的民族分布情况

表 3.4 显示的是民族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出现抑郁的农村老年人比例明显低于不抑郁的农村老年人比例，同时对生活比较满意的农村老年人比例高于对生活比较满意的农村老年人。从总体抑郁倾向、感到不中用指标看，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中抑郁的比例低于农村老年人中抑郁的比例，但在紧张害怕、孤独方面，汉族农村老年人中抑郁的比例又低于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中抑郁的比例，并且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中对生活比较满意的比例也低于汉族农村老年人中对生活比较满意的比例。因此民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

表 3.4 民族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

民族	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孤独		感到不中用		生活满意		
	百分比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汉族	93.15%	30.90%	69.10%	4.18%	95.82%	7.82%	92.18%	26.47%	73.53%	59.76%	40.24%
少数民族	6.85%	29.05%	70.95%	7.47%	92.53%	7.88%	92.12%	22.82%	77.18%	56.85%	43.15%

3.3.5 样本的受教育情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关系

图 3.6 是对样本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描述。3516 位农村老年人中大部分没有上过学，共有 2195 位，占比总样本的 62.43%，1054 位农村老年人上过小学，占比 29.98%，文化程度小学以上的农村老年人 267 位，仅占总体样本的 7.59%。由于过去我国教育资源缺乏，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低，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比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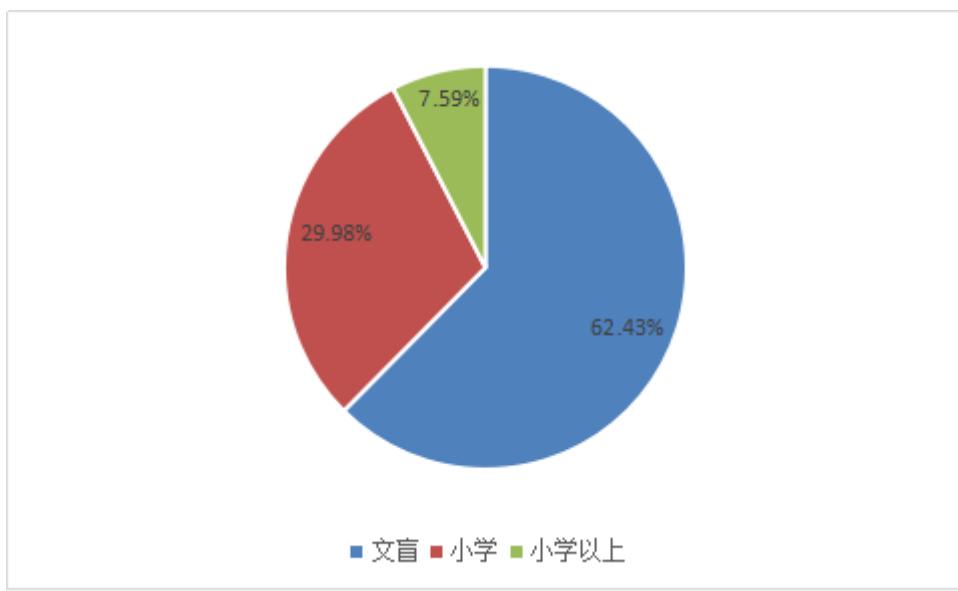


图 3.6 样本的受教育程度

观察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可以发现，无论哪个受教育群体，出现抑郁的比例都低于不抑郁的比例，且对生活满意的比例也都高于对生活不满意的比例。从抑

郁维度来看，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中抑郁农村老人的比例越低，但紧张害怕的情况不同，文盲群体中，感到紧张害怕的农村老人占比4.83%，小学群体中，感到紧张害怕的农村老人占比3.61%，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群体中，感到紧张害怕的农村老人占比4.12%，感到紧张害怕比例最高的是文盲农村老人群体，比例最低的是小学群体，同时，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群体中，对生活满意的农村老人比例相比其他两类群体低，小学以上受教育农村老人群体中，对生活满意的比例最高，达到64.04%。

表3.5 受教育程度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

受教育程度	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孤独		感到不中用		生活满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文盲	34.03%	65.97%	4.83%	95.17%	9.07%	90.93%	29.29%	70.71%	59.86%	40.14%
小学	26.57%	73.43%	3.61%	96.39%	5.69%	94.31%	22.58%	77.42%	57.78%	42.22%
小学以上	20.60%	79.40%	4.12%	95.88%	5.59%	94.01%	15.36%	84.64%	64.04%	35.96%

3.4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的健康状态指标包括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两个变量的描述统计如图3.7。农村老年人样本中，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农村老人2887位，占比82.11%，日常生活能力完好的农村老人2824位，占比80.32%，从中可以看到样本中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较好。可能原因是农村老人参加农业劳动比较多，某种程度上劳动可以锻炼身体，因而农村老人的身体状况整体上比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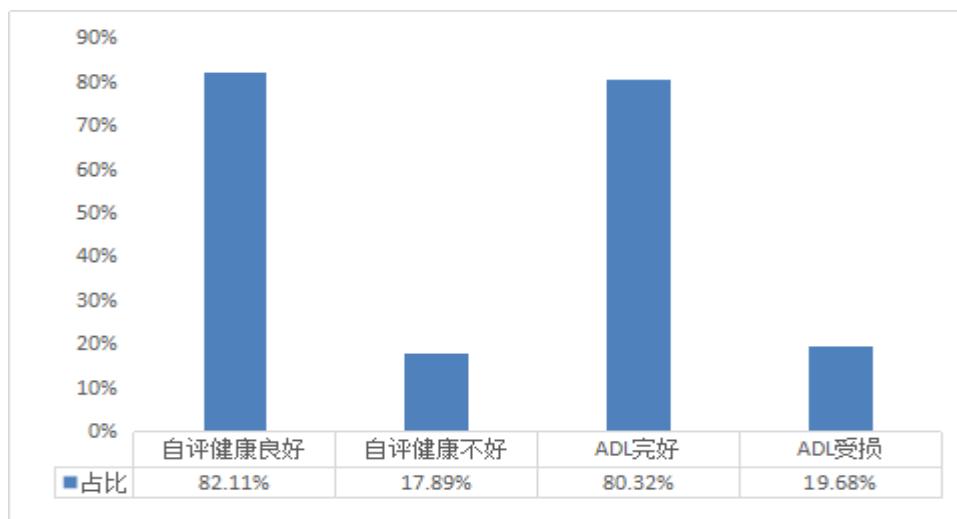


图3.7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从自评健康状况看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如表3.6所示，对于认为自己身体

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抑郁的比例明显小于不抑郁的比例，对生活比较满意的比例也大于对生活不满意的比例。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出现抑郁倾向的比例为 56.60%，高于无抑郁倾向的比例 43.40%，对生活不满意的比例是 68.52%，同样高于对生活满意的比例 31.48%，只有感到不中用的比例与没有感到不中用的比例接近相等。统计结果说明，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较高，无论是从总体抑郁指标还是单项指标，或是从生活满意度来看，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都低于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的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

表 3.6 同样反映了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完好还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出现抑郁的比例都低于不抑郁的比例，对生活满意的比例高于对生活不太满意的比例。无论从总体抑郁倾向还是单项抑郁指标来看，日常生活能力完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陷入抑郁的比例低于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陷入抑郁的比例。从生活满意度来看，日常生活能力完好的群体中，对生活比较满意的农村老年人比例是 59.45%，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的群体中，对生活满意的农村老年人比例是 59.97%，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

表 3.6 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

健康状况	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孤独		感到不中用		生活满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自评良好	25.15%	74.85%	2.56%	97.44%	5.89%	94.11%	21.23%	78.77%	65.67%	34.33%
自评不好	56.60%	43.40%	12.88%	87.12%	16.69%	83.31%	49.13%	50.87%	31.48%	68.52%
ADL 完好	26.98%	73.02%	3.90%	96.10%	7.08%	92.92%	22.77%	77.23%	59.45%	40.55%
ADL 受损	46.24%	53.76%	6.50%	93.50%	10.84	89.16%	40.32%	59.68%	59.97%	40.03%

3.5 不同类型个体对居住方式的选择

表 3.7 显示了自身状况不同的农村老年人对居住方式的选择情况。总样本中性别的均值是 0.45，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性别的均值是 0.39，小于总样本中性别的均值，所以有成年后代群体中女性比例高于无成年后代群体中女性比例，也就是说，女性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与成年后代同住。按照同样的逻辑，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的平均年龄 87.86 岁高于总样本的平均年龄 84.8，说明与无成年后代同住群体相比，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高龄老人数量较多；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婚姻状况的均值 0.27 低于总样本中婚姻

状况的均值 0.41，则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中，丧偶、离异或未婚的比例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丧偶、离异或未婚的比例高；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民族的均值 0.91 小于总样本民族的均值 0.93，说明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少数民族的比例高于无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少数民族的比例；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受教育程度的均值 0.39 小于总样本受教育程度的均值 0.45，则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的整体文化程度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低；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的自评健康均值与总样本自评健康均值都是 0.82，说明有成年后代同住和无成年后代同住中自评健康状况一致；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均值 0.73 小于总样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均值 0.80，则与无成年后代同住群体相比，有成年后代同住群体中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老年人比例较高。总体上，女性、无配偶老年人、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与成年后代同住，而且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更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可以看出，与成年后代同住的群体属于相对弱势群体，可能是因为相对弱势的地位使得农村老年人不得不与成年后代同住，通过同住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照料、经济支持以及精神慰藉，从而满足相应需求，使老年生活得到一定保障。

表 3.7 个体自身状况对居住方式的选择

	总样本		有成年后代同住		无成年后代同住		T 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男性（女性=0）	0.45	0.5	0.39	0.49	0.53	0.5	8.1***
年龄（连续变量）	84.8	11.05	87.66	11.19	81	9.63	-18.9***
有配偶（丧偶/离异/未婚=0）	0.41	0.49	0.27	0.45	0.58	0.49	19.1***
汉族（少数民族=0）	0.93	0.25	0.91	0.28	0.96	0.21	5.0***
受教育程度（文盲=0）	0.45	0.63	0.39	0.6	0.53	0.66	6.4***
自评健康良好（不好=0）	0.82	0.38	0.82	0.38	0.82	0.39	-0.4*
ADL 完好（ADL 受损=0）	0.8	0.4	0.73	0.44	0.89	0.31	12.1***
观测值	3516		2003		1513		

注：*、**、***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第4章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前文对样本的居住方式与心理健康进行交叉分析，可以看出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本部分采用多元 logit 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心理健康的多种测量方式，将分别以总体抑郁倾向、紧张害怕、孤独、感觉不中用以及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讨论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以及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4.1 研究设计

4.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是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 年的数据。该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组织，调查内容涉及老年人的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信息。该调查项目在 1998 年进行基线调查，随后分别在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2008 年、2011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 22 个省、市和自治区¹⁵，随机抽取一半的县、市或市辖区进行入户访问，调查区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85.3%。在 1998 年和 2000 年 CLHLS 的调查对象是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从 2002 年开始 CLHLS 的调查对象范围扩大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结合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使用 CLHLS 2011 年的截面数据，样本共包含 9665 位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 5058 位。删除有缺失值的样本，进入模型的最终样本量为 3516 人。

4.1.2 变量设置及其释义

本研究采用抑郁倾向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来测量心理健康。抑郁倾向通过抑郁倾向量表测量，CLHLS 调查的抑郁倾向量表包含三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到紧张、害怕”、“您是不是经常觉得孤独”、“您是不是觉得越老越不中用”。三个问题的选项一致，均包括五个选项：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本研究将回答“总是”、“经常”视为“是”，将“有时”、“很少”、“从不”视为“否”。如果老年人对上述三个问题中的至少一个回答为“是”，则界定该老年人有抑郁倾向；如果老年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全是“否”，则判定该老年人无抑郁倾向，同时，为了丰富稳健性分析，在总体考察抑郁倾向后，本研究对抑郁倾向的三种描述，即紧张害怕、孤独、感觉

¹⁵ 22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分别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和重庆。

不中用，作为分别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因此，不论是总体抑郁还是抑郁的三种描述，在本研究中都被处理成了二分变量。同样，生活满意度在本研究中也被处理成了二分变量。生活满意度对应调查中的问题“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回答分为五个等级：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分析时将回答“很好”、“好”视为对生活满意，将回答“一般”、“不好”或“很不好”视为对生活不满意。

解释变量是居住方式，本研究关注是否有成年后代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调查中问题“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将老年人的居住分为家人、独居和养老院三种情况，同时结合问题“请列出与您一起居住的住户成员的一些有关情况”，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分为有成年后代同住和无成年后代同住两种类型。成年后代指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配偶、孙子女及配偶、重孙子女及配偶，无成年后代同住包括独居、与配偶同住、与父母或岳父母同住以及与未成年后代同住。

依据控制变量的概念，加入的控制变量既要影响心理健康，又要与居住方式相关，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健康和反映躯体健康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有配偶对应“已婚，并与配偶住在一起”、“已婚，但不与配偶住在一起”两类回答，“离婚”、“丧偶”、“从未结过婚”则归类为无配偶。结合农村老年人实际情况，受教育年限被处理成分类变量：文盲、小学、小学以上。根据问题“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自评健康变量被处理为二分变量，将回答“很好”、“好”、“一般”定义为自评健康良好，将回答“不好”、“很不好”界定为自评健康不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包含洗澡、吃饭、穿衣、上厕所、控制大小便、室内移动这六项活动，分别对应问题“您洗澡时是否需要他人帮助？”、“您穿衣时是否需要他人帮助？”、“您上厕所大小便时是否需要他人帮助？”、“在室内活动时您是否需要他人帮助？”、“您是否能控制大小便？”、“您吃饭时是否需要他人帮助？”，如果老年人能够独立完成这六项活动定义为“ADL 完好”，如果有至少一项活动部分或完全依赖他人的帮助完成则定义为“ADL 受损”。变量的具体赋值如下表。

表 4.1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
被解释变量	心理健康	抑郁倾向	0=无抑郁倾向 1=有抑郁倾向
		紧张害怕	0=不紧张害怕 1=紧张害怕
		孤独	0=不孤独 1=感到孤独
		感觉不中用	0=不感觉无用 1=感觉不中用
		生活满意度	0=生活不满意 1=生活满意
		是否有成年后代同住	0=无成年后代同住 1=有成年后代同住
解释变量	居住方式	性别	0=女 1=男
		年龄	连续变量
		婚姻状况	0=丧偶、离异或未婚 1=有配偶
		社会人口学特征	0=少数民族 1=汉族
控制变量	民族	民族	0=文盲 1=小学
		受教育程度	2=小学以上
		自评健康	0=自评健康不好 1=自评健康良好
		健康状况	0=ADL 受损 1=ADL 完好
		ADL	

4.1.3 模型构建

由于因变量抑郁倾向和生活满意度均为二分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多元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Logit 模型是特别为二元因变量设计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二值因变量 Y 的回归建立了 $Y=1$ 的概率模型，由于采用线性概率模型时，预测值可能会小于 0 或大于 1，而概率的取值区间是[0,1]，所以这种估计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利用累积概率分布函数（c.d.f.）产生的概率位于 0 到 1 之间的特点，建立了非线性回归模型。logit 回归利用了 logistic 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因此 logit 回归也称为 logistic 回归。logistic

累积分布函数有用指数函数定义的具体函数形式，多元总体 logit 模型为：

$$\begin{aligned}
 \Pr(Y=1|X_1, X_2, \dots, X_k) &= F(\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 \\
 &= \frac{1}{1 + e^{-(\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 \\
 &= \frac{e^{\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1 + e^{\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
 \end{aligned} \tag{4-1}$$

以上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经过现行变换操作之后为：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

其中，因变量 Y 是二值的，F 为累积标准 logistic 分布函数，式中 P 代表的是因变量的概率， X_1, X_2, \dots, X_k 代表的是影响发生概率的自变量。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k$ 代表的是自变量对概率的反应系数， β_0 代表截距，都通过最大似然方法进行估计。在本研究中，不同的模型 $Y=1$ 分别代表抑郁、紧张害怕、孤独、感到不中用以及生活满意， X_1 代表是否有成年后代同住， X_2, \dots, X_k 代表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

4.2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回归分析

表 4.2 的回归分析说明了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表 4.2 第一列显示的是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总体抑郁倾向的多元 logit 回归结果。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因素后，与成年后代同住能明显降低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发生比。具体而言，相对于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而言，有成年后代同住对抑郁倾向的回归系数符号是负的，并且在 0.01 的统计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与成年后代同住对抑郁倾向产生负向影响。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几率是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几率的 $e^{-0.28}$ 倍，也就是说，与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几率降低 24%。这一研究结果与沈可（2013）、靳永爱（2017）的研究基本一致^[22, 9]。表 4.2 第二列显示的是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的多元 logit 回归分析，居住方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有成年后代同住与紧张害怕负相关，但是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表 4.2 第三列是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孤独感的多元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因素后，居住方式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成年后代同住与孤独呈负相关关系，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孤独的发生比是无成年后代同住农村老年人孤独发生比的

0.71 ($e^{-0.71}$) 倍，即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的几率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的几率低 29%。表 4.2 第四列显示的是有无成年后代对农村老年人感觉不中用的多元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可能性小。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因素后，居住方式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且在 0.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有成年后代同住对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产生负向影响。与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有成年后代同住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发生比是无成年后代同住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发生比的 0.82 ($e^{-0.20}$) 倍，或者说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几率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几率降低 1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因素后，是否与成年后代同住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产生负向影响，即相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陷入抑郁的可能性更低。显著性方面，除了以孤独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居住方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以总体抑郁倾向、紧张害怕和感觉不中用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居住方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0.01、0.01 和 0.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因此，从抑郁倾向来看，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进入老年阶段面临的社会负面事件增加，可能造成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容易出现抑郁等负面情绪。但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及时获得经济帮助、日常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支持，能有效解决老年人的问题并缓解其负面情绪。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下降导致经济收入减少，并且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年轻时候的积蓄不多，可能会为保障未来生活而担忧。如果与成年后代同住，家庭主要生活开支由子女负担，老年人不会有太多的经济压力，而不与成年后代同住的老年人虽然也会从子女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帮助，但老年人还是会为了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和基本生活操心。其次，由于老年人的各项身体功能不断衰退，生活自理能力相应下降，并且更容易出现疾病，老年人很容易因为生活中的力不从心感到郁闷，同时也会长期因为担忧疾病发生而焦躁。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子女会为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减轻老年人的家务负担，并且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顾，同时与成年后代同住会给老年人一种安全感，当老年人生病时能够及时发现和治疗，这些都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负面情绪。再次，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减少，对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显出更高的需求度，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互动与情感交流，直接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此外，与成年后代同住的老年人可以利用自身经验帮助子女解决问题，从而感受到自身价值，抑制自我否定情绪的发生。

表 4.2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有抑郁倾向=1	紧张害怕=1	孤独=1	感觉不中用=1
有成年后代同住 (无=0)	-0.28*** [0.11]	-0.4 [0.27]	-0.71*** [0.18]	-0.20* 0.12
控制变量				
男性 (女性=0)	0.17 [0.17]	-0.59 [0.38]	0.18 [0.24]	0.21 [0.15]
年龄	-0.14 [0.24]	1.32*** [0.48]	0.86* [0.50]	-0.29 [0.29]
有配偶 (无=0)	-0.94*** [0.28]	-0.42 [0.32]	-1.64*** [0.24]	-0.70** [0.34]
汉族 (少数民族=0)	-0.21 [0.17]	-1.13*** [0.26]	-0.27 [0.24]	-0.05 [0.18]
小学 (文盲=0)	-0.42*** [0.13]	-0.34 [0.28]	-0.2 [0.26]	-0.47*** [0.14]
小学以上	-0.41 [0.49]	0.27 [0.55]	0.38 [0.40]	-0.77 [0.57]
自评健康良好 (不好=0)	-1.21*** [0.14]	-1.19*** [0.28]	-1.13*** [0.26]	-1.21*** [0.15]
ADL 完好 (ADL 受损=0)	-0.47*** [0.15]	-0.76*** [0.28]	-0.06 0.35	-0.38** [0.16]
观测值	3436			

注：方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从社会人口学特征来看，模型 1、模型 3、模型 4 中性别的回归系数是正的，表明性别与抑郁倾向、孤独、感觉不中用均呈正向关系，男性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倾向或感到孤独和不中用，模型 2 中性别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说明男性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的几率小于女性农村老年人。由于性别的回归系数统计上不显著，所以无法拒绝系数等于零的原假设。模型 2 和模型 3 中年龄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且分别在 0.01 和 0.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年龄与紧张害怕和孤独呈正向关系，年龄越大，感到紧张害怕和孤独的可能性越大，年龄每增加一岁，感到紧张害怕和孤独的几率是原来的 $e^{1.32}$ 倍。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功能不断衰退，日常生活能力下降，会因为衰老产生紧张害怕感，同时由于社会交往减少，生活单调而感到孤独。不同的是，以抑郁倾向和感到不中用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年龄的回归系数是负的，表明年龄与抑郁倾向和感到

不中用呈负相关，年龄越大，出现抑郁倾向和感到不中用的可能性反而越小，但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模型 1-模型 4 的回归分析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均是负的，说明有无配偶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产生负向影响，并且以抑郁倾向、孤独和感觉不中用为因变量的 logit 回归分析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0.01、0.01 和 0.0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从数值上看，有配偶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几率是无配偶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几率的 $e^{-0.94}$ 倍，有配偶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的可能性比无配偶农村老年人孤独的可能性降低 81% ($1-e^{-1.64}$)，有配偶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发生比是无配偶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发生比的 $e^{-0.70}$ 倍。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一致，陈华帅（2010）发现丧偶对老人抑郁倾向的影响会持续 3-5 年^[43]。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陷入抑郁的可能性较小，可能是因为老年夫妻在生活中互相关心照顾，精神上互相陪伴和支持，有效抑制了抑郁情绪的发生。回归结果显示，汉族农村老年人不易产生抑郁情绪。具体来看，模型 1-模型 4 的回归分析中，民族的回归系数都小于 0，其中模型 2 中民族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与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相比，汉族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的发生比降低 68% ($1-e^{-1.13}$)。民族对抑郁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汉族是我国人数最多的民族，归属感较强，心理敏感度较低，不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相对比较复杂。在模型 1-模型 4 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回归系数都是负数，说明相对于文盲，上过小学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较小。在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回归分析中，上过小学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上过小学的农村老年人发生抑郁的几率是没有上过学的农村老年人发生抑郁几率的 $e^{0.42}$ 倍。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感觉不中用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上过小学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上过小学的农村老年人感觉不中用的发生率比没有上过学的农村老年人感觉不中用的发生率下降 37% ($1-e^{-0.47}$)。可能原因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年人可以参与更多的娱乐活动，比如下棋、看报等来丰富老年生活，同时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年人可能具有更好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上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的模型中有所不同，在模型 1 和模型 4 中，小学以上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表明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和感觉不中用产生负向影响，即相对没有上过学的农村老年人，小学以上的农村老年人不容易出现抑郁倾向或感觉不中用。然而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小学以上的回归系数为正的，说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感到紧张害怕和孤独的可能性比没有上过学的农村老年人感到紧张害怕和孤独的可能性更大。可能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村老年人对自身要求比较高，心理上很难接受衰老和无用的事实。

从健康状况来看，在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影响的四个模型中，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都是负数，且均在 0.0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自评健康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看，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可能

性是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可能性的 $0.30 (e^{-1.21})$ 倍，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的发生比是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发生比的 $0.30 (e^{-1.19})$ 倍，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的几率比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的几率降低 $68\% (1-e^{-1.13})$ ，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可能性比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可能性降低 $70\% (1-e^{-1.21})$ 。表中结果显示，模型 1-模型 4 中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都是负数，说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具有负向影响。其中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4 中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1%、1% 和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具体从数值上来看，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与抑郁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农村老年人陷入抑郁的可能性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陷入抑郁的可能性的 $0.63 (e^{-0.47})$ 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对紧张害怕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的发生比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发生比的 $0.47 (e^{-0.76})$ 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对感到不中用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几率比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感到不中用的几率降低 $32\% (1-e^{-0.38})$ 。总体上，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身体越健康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越小。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在生活上可以照顾自己，不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不会感到自己不中用，并且身体健康的行动自由，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和事，有效缓解了孤独等抑郁情绪。

4.3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接下来分析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表 4.3 采用多元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与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具体来说，在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中，居住方式的回归系数是正的，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因素后，与无成年后代同住的老年人相比，有成年后代同住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更大。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发生比是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发生比的 $1.39 (e^{0.33})$ 倍，或者说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几率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几率高 $39\% (1-e^{0.33})$ 。生活满意度是老年人对整体生活状态的评价，如前文讨论，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及时获得经济帮助、日常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缓解了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同样代际支持也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仅缓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精神压力，同时改善了老年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对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帮助。子女为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及日常生活照顾，不仅减轻了老年人生活上的无助感以及对未来疾病的担忧，还使得老年人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社会交流活动，

同时对于躯体功能出现障碍的老年人，子女在生活上的照料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子女的陪伴和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也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接触的是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并且能够从子女那里获得更多新的有趣的信息，这些对于老年人保持乐观健康的生活状态有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子女赡养老年人传递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多代同堂的传统居住方式也体现了共同居住是赡养老年人的最好安排，因此对老年人来说，能够与成年后代同住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欣慰。并且老年人在享受成年子女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时感觉到自己教子有方，提高了老年人的成就感，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在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多元 logit 回归分析中，性别、民族和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是正数，说明男性、汉族、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中自评健康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自评健康良好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发生比是自评健康不好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发生比的 $5.10 (e^{1.63})$ 倍。可能原因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免受疾病的摧残，自然比遭受疾病痛苦的老年人幸福感要强，另外，身体健康的老年人行动方便，有条件参加更多的社会交流活动，其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因而对生活也更加满意。回归分析结果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是负的，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越低，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反而低于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几率越小。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在 0.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与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降低 26% ($1-e^{-0.30}$)。有配偶的老年人可能需要负担配偶的经济支出，照顾配偶的日常生活，造成身体劳累和心理负担，降低生活满意度。

表 4.3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生活满意=1
自变量	
有成年后代同住 (无=0)	0.33*** [0.11]
控制变量	
男性 (女性=0)	0.09 [0.24]
年龄	-0.84 [0.60]
有配偶 (无=0)	-0.30* [0.17]
汉族 (少数民族=0)	0.06 [0.20]
小学 (文盲=0)	-0.12 [0.14]
小学以上	-0.42 [0.43]
自评健康良好 (不好=0)	1.63*** [0.15]
ADL 完好 (ADL 受损)	-0.26 [0.17]
观测值	3436

注：方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第5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11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 (CLHLS) 跟踪调查数据, 采用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 根据老年需求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 在回顾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围绕居住方式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下对相关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

5.1.1 有成年后代同住对缓解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显著作用

总的来说, 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可能性比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小。从单项抑郁指标来看, 与无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相比, 有成年后代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紧张害怕、孤独和感到不中用的可能性均较小。可能原因是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及时获得经济帮助、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 通过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缓解了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减轻了老年人的经济压力, 使其不再因收入减少而对未来生活担忧; 子女为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和生活照顾, 解决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困难, 同时与成年后代同住带给老年人安全感, 当老年人生病时能及时发现和治疗; 与成年后代同住方便老年人与子女进行互动与情感交流, 直接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 此外, 老年人利用自身经验帮助子女解决问题, 抑制了老年人产生无用感和自我否定。

5.1.2 有成年后代同住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与成年后代同住是老年人获得经济帮助、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的最好居住方式。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仅缓解了经济危机给老年人带来的精神压力, 同时改善了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 子女为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及日常生活照顾, 使得老年人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 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社会交流活动, 同时对于躯体功能出现障碍的老年人, 子女在生活上的照料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所处的是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 并且能够从子女那里获得更多新鲜有趣的信息, 这些对于老年人保持乐观健康的生活状态有重要作用。此外,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以及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 与成年后代同住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 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欣慰, 而且在享受子女帮助和支持时老年人会感到自己教子有方, 提高了老年人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5.2 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结论认为，与成年后代同住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当鼓励和支持成年后代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结合国内外经验，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2.1 弘扬传统孝文化，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同住

通过弘扬传统的孝文化，增强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养老的基础。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愿意和老年人生活在一起。另外伴随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利益成为人际关系的关键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忙于赚钱，忽视了对父母的赡养，随着年龄增长和生理变化，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甚至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照顾老年人对子女来说成为一种负担，子女赡养的传统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在社会中宣传孝文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政府可以将孝文化纳入到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中，立法机构可以适时补充修改相关法律来保证孝文化的贯彻执行；其次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孝文化，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或近距离居住，比如在日本有一种社会习俗，即只有父母与已婚孩子共同生活才被视为是正常的、美满的生活形态，即使子女与老年人分开居住，为了保证子女能经常回家看看，日本提倡“一碗汤距离”，即子女与父母居住的最佳距离是“煲好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凉”。

5.2.2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全面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居家养老实质上是一种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支撑的新型养老模式。在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可以居住在家里，享受子女的陪伴与支持，同时由社区和社会为老年人提供购物、清扫、看护等日常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减轻家庭成员的养老负担。大力开展居家养老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应当作为责任主体，有规划地建设或改建一批福利服务设施和活动场所；其次政府应当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对于投资和兴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经济实体和社会组织，政府应当提供政策优惠或财政补贴；此外应当致力于拓展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和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探索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在满足老年人日常照料需求的基础上，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样化服务，同时通过培训现有养老服务人员和培养专业服务人员的方式，建设高素质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全面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5.2.3 推进适老化改造，建设老年人宜居环境

适老化改造是通过改造家庭环境设施以及配备器具，来增强老年人居住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为实现家庭养老提供保障。推进适老化改造需要顶层设计，并且家庭的适

老化改造要和社区的照护功能相配套。实际上，国内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探索适老化改造。北京市对老旧社区实施无障碍改造，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对社区和居家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成都在部分社区启动适老化改造的试点工作，首批试点改造由成都市福利行业协会联合社会企业、社会组织，重点对经济困难、失独失能老年人家中的客厅、浴室、卧室进行改造；合肥市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对适老化改造工作进行创新，在小区改造中试点了物联网应用、老年人定位求助、老年人跌倒自动检测等多项服务。适老化改造是一项大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更好的服务。

5.2.4 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子女与老年人同住

政府应通过税收、休假等多种优惠方式，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人同住。通过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不仅能够减轻年轻人的经济负担，也是对传统孝道的一种肯定。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来引导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为了防止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新加坡政府出台住房补贴及税收优惠来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比如住房方面，年满 35 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开发的房子，如果跟父母同住可享受 2 万新元的房屋津贴，如果子女与老人的居住距离比较近，子女也会享受到一定的住房补贴；在税收方面，与年老父母共同居住的纳税人可享受扣税额最高 5000 新元的优惠，此外，如果有子女愿意与丧偶父亲或者丧偶母亲共同居住，则对于父母遗留的房子可享受减免遗产税的优待。韩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养老，对于赡养老年人五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家庭，在继承遗产时可享受税收额 90% 的减免，且每赡养一位老年人就能扣除 3000 万韩元的遗产税；如果纳税人需要赡养男 60 周岁以上或女 55 周岁以上的直系亲属，则每年可享受 48 万元的所得税免除额；如果父母和子女都分别拥有住房，但双方选择在一起共同生活，则对于任何一方将房屋出租或者出售的获得的收入免除所得税；对于本人或者配偶与直系亲属老年人共同生活超过两年的，在购置住房、新建住房和改造住房时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

5.2.5 健全随迁政策，保障随迁老年人生活便利

由于工作原因，很多年轻人定居他乡，即使愿意与老年人一起生活，也会因为各种政策不便无法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因此，政府应当健全随迁政策，保障随迁老年人的生活便利。对于与子女共同居住的非本地老人，政府应当在户口设置、医保结算、公共交通、进入公园等方面提供便利。云南省政府在老年人服务方面积极推行“同城同待遇”，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常住非户籍老年人，在卫生保健、交通出行、文体休闲、公共法律服务和商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都具有同等优待，并且在老年人户口方面，政府规定 8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随子女迁移户口，同时对于 65 周岁以上老年

人随子女迁移户口可适当放宽条件。同样，青海省为了鼓励家庭赡养，允许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随子女在省内迁移户口，随迁老年人在迁入地依法依规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交通出行、文化体育及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在出台宏观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老年人随迁政策，为实现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创造便利。

5.2.6 开发亲情住宅，方便子女和父母同住

亲情住宅是居家养老的升级版，老年人与子女近距离居住一方面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可以互相照应，另一方面又能保护各自的隐私和享受独立空间。在日本，楼市设计中运用“一碗汤距离”的理念，在一个小区内分别设计适合老年人的居住户型和适合年轻人的居住户型，使得有条件的子女和老年人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小区，为父母与子女近距离居住提供了条件。新加坡政府为方便父母与子女同住，开发了三代同堂组合式房屋，这种房屋针对不同代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采用两户既分又合的原则，在房屋的室内空间布局方面做出了相应调整，使得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又保持各自的生活空间。我国也鼓励代际亲情住宅的开发与建设，促进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或者近距离居住，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优化代际亲情住宅户型设计，打造代际亲情组合住宅单元方面还需要不断探索。

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丰富并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主要贡献有两方面：第一，丰富了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家庭结构角度去探讨居住方式，而本研究关注老年人的同住对象。基于老年需求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本研究猜测与成年后代同住对老年人，尤其是社会养老资源匮乏的农村老年人的老年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与成年后代同住的老年人能够及时获得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帮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从而满足其养老需求，有效抑制抑郁情绪，提高生活满意度。第二，已有文献大都研究的是整体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但基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群体，居住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利用 CLHLS 2011 年数据专门研究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分析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对抑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时，本文采用的是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既影响因变量心理健康，同时又与自变量居住方式相关的变量，如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进行控制，试图得到更准确的系数估计量。但是，由于模型中不可观测遗漏因素的存在，本研究未能克服自变量居住方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老年人的个性、人生观等。天性乐观独立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不与成年后代同住，他们表现出抑郁倾向的可能性也较低。在此情形下，若将居住方式仍然视为外生变量，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则会有明显的偏误。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来消除自变量居住方式的内生性，从而更准确的识别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孙鹃娟.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 人口学刊, 2006(4): 14-18
- [2] Guo M, Aranda MP, Silverstein M. The impact of out-migr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in rural China[J]. Ageing & Society, 2009(7): 1085-1104
- [3] 宋璐, 李亮, 李树苗.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2): 115-125
- [4] 江克忠, 陈友华. 亲子共同居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吗? ——基于 CLHLS 数据的证[J]. 人口学刊, 2016(6): 77-86
- [5] Hugo.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J]. Asian &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02(1): 13-46
- [6] 宋月萍.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 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J]. 人口与发展, 2014(4): 37-44
- [7] 舒玢玢, 同钰莹.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 不远游”[J]. 人口研究, 2017(2): 42-56
- [8] M Murphy, E Grundy, S Kalogirou. The increase in marital status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up to the oldest age in seven European countries[J]. Population Studies, 2007(3): 287-298
- [9] 靳永爱, 周峰, 翟振武.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J]. 人口学刊, 2017, 39(223): 66-77
- [10] 周建芳, 薛志强, 方芳等. 独居老人抑郁症状和抑郁症的调查[J]. 上海精神医学, 2008(3): 136-138
- [11] 张河川, 张晓芬, 郭思智. 独居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10(4)
- [12] Silverstein, M. , Z. Cong and S. Li, 2006,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1(5): S256-S266
- [13] 姚引妹.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 2002(6): 20-27
- [14] Rossi, Alice S. and Peter H. Rossi. Of Human Bond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 Across the Life Course[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 [15] E Litwak, S Kulik. Technology, Proximity, and Measures of Kin Support [J].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1987, 49(3): 649-661
- [16] 王小龙, 兰永生. 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J]. 南开经济研究, 2011(4): 21-31
- [17] 任强, 唐启明. 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4): 82-91
- [18] An, J. , K. An, L. O' Connor and S. Wexler, 2008, “Life Satisfaction,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among Elder Korean Women: Focus on Living Arrangements, ”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Nursing, 19(2) 151-160
- [19] Hughes, M. E. And L. J. Waite, 2002, “Health in Household Context: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Health in Late Middle Age, ”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3, 1-21
- [20] 森冈清美・望月崇. 新しい家族社会学[M]. 日本: 培风馆, 1999: 136-47

- [21] 穆滢潭, 原新. 居住安排对居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J]. 南方人口, 2016(1): 71-80
- [22] 沈可, 程令国, 魏星. 居住模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3(6): 89-100
- [23] 唐丹. 城乡因素在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模型中的调节效应机制. 人口研究. 2010(3): 11-16
- [24] 杜鹏. 北京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变化[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2): 36-41
- [25] 曾毅, 王正联. 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5): 2-10
- [26] 孙鹃娟. 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现状与变动特点[J]. 人口研究, 2013(6): 35-42
- [27] 郭志刚. 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 2002(1): 37-42
- [28] 陆杰华, 白铭文, 柳玉芝. 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研究[J]. 人口学刊, 2008(1): 35-41
- [29] 曲嘉瑶, 杜鹏. 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对空巢居住的影响[J]. 人口与发展, 2014(2): 87-94
- [30] 张文娟, 李树苗.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1)
- [31] 杜鹏, 武超. 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 人口经济, 1998(4): 30-38
- [32] 王萍, 左冬梅.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的纵向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6)
- [33] 张莉. 对我国高龄老人居住方式影响因素的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0): 92-102
- [34] 鄢盛明, 陈皆明, 杨善华.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 [35] 席红艳. 居住方式、医疗服务利用对我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D].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2016
- [36] 殷恒掸, 傅雪林. 对体育锻炼心理健康效应研究的分析和展望[J]. 体育科学
- [37] Lin Nan, Alfred Dean, Walter M. Ensel. Social support scales: A methodological note[J]. Schizophrenia Bulletin, 1981, 7(1): 73-89
- [38] 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1): 67-77
- [39] 贺寨平. 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1): 76-83
- [40] 蔡禾等. 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J]. 社会学研究, 1997(6): 8-16
- [41] 郑杭生等.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转型[J].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319
- [42] BWellman, P J Carrington, A Hall. Network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Social Structure:A Network Approach, 1988: 496-512
- [43] 陈华帅. 婚姻对老年健康及照料成本影响的人口经济学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0

致谢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即将收尾，心中如释重负。在此我要对研究生期间给过我帮助的老师同学们表达感激之情。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徐芳老师，徐老师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为了我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从她的专业角度提出论文修改建议。为了提高我的学术研究能力，徐老师给我提供参与课题的机会，她严谨的科研态度和追求完美的做事风格都深刻影响着我。

感谢人才系的徐斌老师、魏华颖老师、陈小平老师、陈书洁老师、苗仁涛老师，在参与课题研究期间老师们对我耐心指导，每次课题会议我都能学到很多。尤其是魏华颖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写好文献综述，在外出调研期间对我十分关心，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和感动。

感谢王晓霞老师对我毕业论文的帮助，王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也给予了诸多指导，每一封邮件都会认真地回复，甚至牺牲休息时间对我面对面辅导。感谢黎煦老师在计量经济学和 stata 方面的启蒙和传授，以及对我毕业论文实证分析部分的建议和指导。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同学对我的支持，你们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硕士学位论文